

19 世纪以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 及其对当前社会的影响^{*}

戴晓琦

内容提要 1805 年以来，埃及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 4 个明显不同的时期：1805 ~ 1840 年的第一次独立建构期（穆罕默德·阿里时期）、1840 ~ 1952 年的第一次外力影响期（包括赛义德与伊斯梅尔时期、殖民与半殖民时期）、1952 ~ 1970 年的第二次独立建构期（纳赛尔时期）与 1970 ~ 2011 年的第二次外力影响期（萨达特 -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影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制约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导致社会长期动荡不宁。19 世纪以来埃及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埃及 阶级结构 阶级分层

作者简介 戴晓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24）。

1805 年执政后，穆罕默德·阿里（1805 ~ 1849 年任埃及总督）在埃及推行了大规模的改革，阿拉伯地区在迈向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开始了长时期的动荡不宁。2011 年伊始，埃及又一次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规模反政府运动。阿拉伯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为什么会如此颠簸震荡？笔者以为，只有进入阿拉伯社会内部，探索阿拉伯社会结构的演变规律，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社会结构的核心是阶级结构，200 年来阿拉伯社会的阶级结构演变体现了阿拉伯社会内部演变的基本规律。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 200 多年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轨迹、结构特征及阶级演变对当前社会的影响，分析埃及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揭示持续动荡的社会根源，并由此揭示阿拉伯非石油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及持续动荡的社会根源。

200 年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

（一）埃及阶级结构的第一次独立建构期（1805 ~ 1840 年）

18 世纪以前，埃及的权力结构比较稳定。从 16 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到 18 世纪初，埃及一直处于军事封建体制的统治下。埃及的主要财富——土地一直归国家所有^②，但不断壮大的地方势力开始控制土地的税收。他们在向政府上缴规定的土地税后将剩余地税留给自己，形成了包税制度。盘踞埃

^{*}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级重点课题“当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前期成果。

^② 埃及的土地在 18 世纪以前一直主要由国家所有，此外还有占 1/10 的伊斯兰教产以及少量的村落共有土地以及荒地。在土地使用上，埃及以村落为单位由军事贵族具体管理并代征地税，称包税制。从 19 世纪中期到末期，是埃及国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但一直以来国家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土地。

及的土耳其贵族与马木鲁克是主要的包税人,他们通过包税制度搜刮埃及的财富。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包税人控制,包税人不仅可以随意决定领地内农民的税额,而且可以继承与买卖土地。这样,埃及形成了以控制土地的包税人为主的社会上层,和以依附土地为生的社会下层。社会上层是来自埃及以外的奥斯曼帝国的管理者与马木鲁克军队,而绝大多数埃及人都处于社会下层。因此,埃及社会呈现为外族上层与埃及下层的“二”字结构,社会处于相互隔离状态。

18世纪以后,这一局面被彻底改变了。埃及逐渐从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转入西方殖民者手中。1700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反奥斯曼联盟签订卡尔洛维茨条约,标志着在对欧洲的长期鏖战中,帝国已经处于下风,并被迫将防御重点放在欧洲地区,从而放松了它对阿拉伯地区尤其是北非地区的控制。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人乘机设法摆脱帝国的控制。1769年,近卫军首领阿里贝废黜奥斯曼总督后宣布独立,派兵攻占汉志与叙利亚。1773年阿里贝被杀,近卫军发生内讧,埃及局势陷入混乱。1798年,拿破仑率法军占领埃及,1801年被英国赶走。在英、法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争夺中,埃及暂时出现权力空缺,近卫军首领穆罕默德·阿里(以下简称阿里)乘势崛起。

在这一权力转换中,埃及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二”字结构演变为梯形结构。

阿里洞悉国际形势的变化,深知只有建立强大的军队才能实现自己的帝国梦。为此,他实行了现代化改革。首先,消灭马木鲁克并没收其土地,打击宗教势力并没收其教产(占埃及耕地的1/10),将土地分给农民,大大削弱了腐败上层的势力,缩小了埃及社会各阶级的差距,聚合了普通大众的力量;其次,兴办国营工厂,控制粮食与工业品的生产与供销,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后,他凭借自己经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1839年有陆军23万人,海军1.5万人,战舰32艘)东伐西讨、南征北战,迅速扩张版图,至1833年,阿里控制的范围东起叙利亚,西至利比亚,北括托罗斯山,南抱苏丹。

阿里的现代化改革,彻底改变了埃及的阶级结构:农民摆脱了对包税人的人身依附;军需刺激了几十家官办工厂的建立,造就了数万产业工人。农民和工人构成了社会的下层。大办新式学校,大力培养具有管理能力的行政人员,这一现代管理队伍成为新中产阶级的主体。数十万军队沿袭了埃及最重要的阶层——军事阶层,军官们掌握实权,成为新上层的核心,普通士兵则居于社会中层。

(二) 埃及阶级结构的第一次外力影响期(1840~1952年)

阿里势力的崛起打乱了英、法的全球殖民战略,英、法联合奥斯曼帝国大败阿里军队,迫使其于1840年签订《伦敦条约》,规定埃及军队退回本土,军队数量从20多万减至1.8万人,埃及须向欧洲开放市场等。埃及国力从此一蹶不振。为了维系政权,阿里放弃了大部分改革措施:停办工厂,停止土地改革,恢复伊斯兰教产,新的包税制形式“允诺田”^①开始出现。

在欧洲列强的步步紧逼下,阿里的孙子赛义德(1854~1863年任总督)与伊斯梅尔(1863~1879年任总督)开始了“西化”改革,而西化改革又助推了英法势力对埃及的进一步渗透。1882年,英、法利用埃及政府的巨额债务接管了埃及财政,从而控制了埃及,直到1922年埃及获得名义上的独立,1952年才真正实现独立。此间,埃及一直处于殖民地状态。

在殖民地化过程中,埃及的阶级结构再次发生了转型,以地主—农民为主的农业阶级与以资本家—工人为主的资本阶级构成了新的阶级体系。在此转型中,土地的私有化与资本的扩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土地的私有化导致了农业各阶级的产生。阿里改革被西方殖民者扼杀后,阿里为支撑艰难的局面,把向贵族、行政与军事官员赏赐耕地作为俸禄,土地制度倒退到改革以前的包税制模式。赛义德

^① 允诺田是从未能完成纳税的人手中没收的耕地,阿里家族从1840年开始将其交给允诺缴税的军事将领与达官显贵,阿里时期为120万费丹,占当时土地的1/3以上。参见[埃及]赛依德·阿布杜哈里木·兹耶特《社会阶级结构》(阿拉伯文版),大学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取消村庄集体纳税, 实行个人纳税, 放弃政府对土地的控制, 允许农民自由种植与销售, 耕地在拥有、耕种并交纳地稅 15 年后可以获得全部所有权。伊斯梅尔在巨额债务的压力下, 被迫出售耕地, 甚至在 1871 年穆格巴勒法中规定, 耕地使用者在一次性交纳 6 年的地稅后, 可获得永久免税权。至此, 埃及的全部耕地使用者获得了其耕地的所有权, 耕地全部被私有化。耕地的私有化导致耕地所有权成为社会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 在此之后的 100 年中, 按拥有土地的多少, 埃及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土地阶层: 地主 (拥有土地 50 费丹以上)、富农 (拥有土地 20 ~ 50 费丹)、中农 (拥有土地 5 ~ 20 费丹)、小农 (拥有土地 1 ~ 5 费丹)、贫农 (拥有土地 1 费丹以下) 与没有土地的赤贫者 (又称农业工人)。这些阶层经过 19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 到 1882 年英国殖民埃及前夕初步确立, 于 20 世纪前半叶得到全面发展。直到 1952 年以后, 该阶级结构被纳赛尔政权瓦解。

西方资本的输入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张催生了埃及的欧洲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阶级。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下, 赛义德和伊斯梅尔采取了一系列西化政策: 开放市场, 废除奴隶制度, 实行生产与贸易自由。这些政策减少了政权对个人的人身限制, 刺激了私人经济与资本的发展, 导致了欧洲资本家的涌入与民族资本家的产生。大批欧洲资本家跟随殖民者涌入埃及, 他们相互勾结, 共同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 成为埃及社会上层中的上层。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此后随着殖民势力衰退, 欧籍资本家也相继退出了埃及。

在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中, 地主是上层阶级的主体, 贫农与农业工人是下层的主体, 上层规模很小, 下层规模很大。1900 年, 上层地主占总农业人口的 1.3%, 中层的富农与中农为 15.4%, 下层小农与贫农、农业工人为 83.3%。1950 年的农业人口中, 上、中、下层的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 0.5%、5.2%、94.3%^①。至 1952 年, 在整个社会中, 上层、中层与下层分别占埃及总人口的 1%、19% 与 80%。^② 阿里执政前, 在埃及的欧洲人有 2 万 ~ 4 万人^③, 1864 年升至 9 万人, 1882 年又升至 13 万人^④。正是在这些人中, 产生了欧洲资本家。1850 ~ 1914 年间, 他们向埃及输入的资本高达两亿埃镑, 1919 年输入的欧洲资本甚至占埃及资本总量的 91%。^⑤ 他们不仅垄断了埃及的主要出口产品棉花, 而且通过信贷掌控了各地农村, 从而控制了地主阶级。

(三) 埃及阶级结构的第二次独立建构期 (1952 ~ 1970 年)

该时期从 1952 年自由军官革命开始, 到 1970 年纳赛尔去世结束, 其中又可细化为 1952 ~ 1961 年的纳赛尔前期与 1961 ~ 1970 年的纳赛尔后期。纳赛尔前期, 新政权延续阿里家族后期的自由经济政策, 鼓励私人资本主义; 纳赛尔后期, 实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⑥, 国家直接掌控经济, 成为经济主体。独立的政权、自主的经济, 使埃及阶级再次进入了独立建构期, 阶级结构也再次发生了转变, 由金字塔式的 3 个基本阶级演变为梯形的两个阶级。这种演变源于埃及的独立与纳赛尔的一系列改革。

1952 年, 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阿里家族的最后国王法鲁克, 建立了埃及共和国。共和国初期, 国内矛盾尖锐, 国际形势复杂。在国内, 占人口 0.5% 的地主阶级拥有 34.2% 的耕地, 而占人口 94.3% 的小农与贫农只占 35.4% 的耕地。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以及地主阶级依靠地租坐食其利的生产方式, 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国际上, 阿拉伯人在 1948 年的阿

① [埃及] 法塔赫·阿布杜·法塔赫 《埃及乡村》(阿拉伯文版), 埃及图书总社, 1998 年版, 第 92 页。

② [埃及] 贾拉勒·艾敏 《中产阶级与埃及社会之忧》(阿拉伯文版), 新月出版社, 开罗, 1991 年版, 第 70 ~ 71 页。

③ G. H Gibb and H. Bowen, *Islamic Society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28 - 230.

④ [埃及] 艾哈迈德·宰伊德 《社会学及其在埃及农村的运用》(阿拉伯文版), 开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07 页。

⑤ [埃及] 哈桑·穆罕默德·拉比阿 《跨时代的埃及: 埃及政治、社会与经济研究》(阿拉伯文版) 第 1 册, 阿拉伯拜延将军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 77 页。

⑥ 关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埃及社会性质, 埃及学者众说纷纭, 有的将其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 有的认为其是社会主义, 本文取迈哈茂德·侯赛因与尤兰·塞尔布尼以及艾哈迈德·宰伊德等学者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

以战争中失败,深深刺伤了埃及民众的感情,又逢西方国家拒绝兑现许诺给埃及的阿斯旺大坝贷款。这一新的形势激发了新政权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决心摆脱西方束缚。1956年,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所有,随后英、法与以色列发动的第二次中东战争被苏联与美国所遏制。战争结局给纳赛尔带来了极高的国内外声誉,实力得到加强的纳赛尔政权随后推出了一系列改革。

纳赛尔改革包括农业、工商业与教育改革等。农业改革包括土地所有制改革与租赁改革。前者是先后3次征购、没收地主耕地99万费丹^①(占其耕地122万费丹的81%),将其分给了34.2万户农民,^②极大地削弱了地主的势力。后者是下调地租25%^③,新地租不得超过耕地税的7倍,并且规定地主不得驱逐耕地上的佃户。这一措施涉及全国60%以上的土地,由于地租失去了利益诱惑,地主、富农开始与农民一样参与耕作,佃农的地位与生活得到改善。工商业改革是对外国资本的埃及化、私有资本的国有化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合作社化。至1964年年底,国有化运动涉及85%的工业机构,被国有化的资本占当时注册资本的1/3以上。^④通过国有化运动,外国资本全部收归埃及所有,私人资本被限制在1万埃镑以内,大资本家阶级由此不复存在。政府利用被没收资本建立起强大的国有工业体系,包括拥有17万名工人的750家工厂。^⑤国企掌控了非农业领域80%的经济命脉,发挥了经济主导作用。同时,合作化大大减少了私人资本在商业领域的存在。教育改革则是从小学到大学实行全程免费,为中下层阶级的向上流动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渠道。

纳赛尔改革涉及社会的所有领域,大规模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化:地主阶级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大资本家阶级的势力被消灭,原上层阶级由此基本消失;中小资本家与富农联合掌权,由中产阶级升为上层阶级,国企工人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家的主人;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

在阶级结构的转型中,变化最大的是中产阶级。他们不仅在数量上获得了很大发展(达到总人口的20%~25%,主要是从25万增至120万的行政事业人员以及从无到有的80万国企工人),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他们在原有的上层被取缔后自然上升为新的上层(阿拉伯社会学界仍称其为中产阶级)。大批下层人士升到上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下层阶级的规模减至总人口的75~80%^⑥。纳赛尔时期,埃及的非体力劳动者从87万增至150万,即从12.4%增至17.9%;而体力劳动者只从595万增至665万,其比例从85.1%降至79.2%。^⑦

除了跨阶级的向上流动外,中层与下层阶级内部也呈现整体性向上流动的态势。纳赛尔时期,经过3次土地改革,地主的近百万费丹耕地被分配给小农与贫农,使后者的耕地面积比例不断增加,从1950年的35.4%^⑧增至1952年第一次土改后的46.6%、1961年第二次土改后的52.1%以及1965年的57.1%。^⑨

① [埃及] 阿里·赖伊拉 《埃及50年来的社会力量及其变迁》(阿拉伯文版), 出自《埃及社会变迁50年》, 埃及社会与刑事研究中心, 2003年版, 第56页。

② [埃及] 迈哈茂德·阿布杜·法德尔 《埃及农村经济变迁(1970-1952)》(阿拉伯文版), 第214页。

③ [埃及] 塞阿丁·易卜拉辛 《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阿拉伯文版), 出自《埃及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 埃及图书总社, 1993年版, 第619页。

④ [埃及] 阿布杜·法塔赫·哲拜里 《停滞与发展: 埃及经济问题》(阿拉伯文版), 埃及金字塔政治研究中心, 2004年版, 第96页。

⑤ [埃及] 贾拉勒·亚赫亚 《落后与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阿拉伯文版), 开罗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 第324页。

⑥ [埃及] 阿布杜·穆尼阿木·贾米依 《稳定与变化中的埃及社会》(阿拉伯文版), 文化宫总局出版社, 2008年版, 第38-41页。

⑦ [埃及] 赛阿丁·伊卜拉辛 《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阿拉伯文版), 载 [埃及] 焦代·阿布杜哈里格著 《埃及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 埃及印书总局, 1993年版, 第640页。

⑧ [埃及] 法塔赫·阿布杜法塔赫 《埃及农村》(阿拉伯文版), 埃及印书总局, 1998年, 第92页。

⑨ [埃及] 艾哈迈德·宰伊德 《埃及的结构调整政策》(阿拉伯文版), 开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77页。

（四）埃及阶级结构的第二次外力影响期（1970～2011 年）

该时期包括萨达特时期与穆巴拉克时期。其中，萨达特时期又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穆巴拉克时期又分为 1991 年经济改革以前与之后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与阶级变化沿着同一轨迹前行，因此我们将其统称为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以下简称萨—穆时期）。萨—穆时期是埃及阶级结构的第二次外力影响期，阶级结构由梯形再度转变为金字塔形，1991 年后又向哑铃形转变。这种转变源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惨败，战后埃及失去了西奈石油收入以及运河管理费，而且还要安置运河区后撤的上百万居民，并积极备战以收复国土，使已经明显减速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为走出困境，1973 年萨达特利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有利局面迅速推行了对外开放与自由资本主义政策。

1973 年战争以后，萨达特政府出台了《十月文件》与 1974 年 43 号法，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政策旨在吸引外资与阿拉伯资本，自由资本主义旨在激励本国发展经济。萨达特取消了纳赛尔政府的相关限制政策，返还政府监管的资本家与地主的资产，鼓励他们发展经济。

由于埃及社会被突然“松绑”，弱势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强势的西方经济的迅速覆盖，国有经济的地位逐渐被自由资本主义所取代，西方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原来的资本家与地主的势力迅速上升，官商勾结的寻租经济开始在埃及蔓延。

1981 年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萨达特的各项政策。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的石油高价带来的经济繁荣后，埃及遭遇了经济严寒期。石油价格一落千丈，国际债务沉重难还，加上 1991 年海湾战争中 84 万劳工回国^①，导致埃及财政濒临崩溃。1991 年，西方贷款国深刻认识到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大国作用，遂减免其一半国际债务，但同时要求其进行彻底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穆巴拉克开始了持续 20 年的结构调整与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与经济改革旨在彻底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革分为金融货币改革与私有化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放开汇率与金融市场。第二阶段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与耕地的新租佃法，这是改革的核心。前者包括 314 家国企逐步私有化，后者规定耕地完全进入市场，放弃对地租的最高限额以及对佃农的政策保护。

经过政府 30 多年对传统社会分层要素的改革以及四大外汇来源等新要素的出现，埃及政治与经济发生了巨大转型：政治上，亲美离苏，与以色列和解。经济上，开放国内外市场，实行了比较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埃及的金融市场结束了货币商对美元的长期操控以及美元化现象，^②基本稳定了国内金融与资本市场；私有化改革中，已有 193 家国企改制为私企，^③国营经济在埃及经济中的比重已明显低于私营经济。

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这一转型引起了阶级结构的转型，促使埃及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阶级大分化与大组合。由于国门突然大开，国外力量迅速深入各个领域，萨达特政府的官僚与投机商利用这一机遇一夜暴富；石油价格的暴涨诱使数百万埃及劳工出国淘金，短期内迅速致富；石油工人的出国又导致国内服务业劳动力奇缺，适逢四大外汇收入助推埃及经济迅速繁荣，基础设施建设随即迅速铺开，引起劳动力价格大幅攀升，吸引上百万农民进入城市加入到基建中。这些人的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都获得了很大提升，实现了向上的阶级流动。与此同时，滞留在行政、事业等领域的工薪收入者（即中产阶级的主体）却在洪水猛兽般的通货膨胀中陷入贫困，迅速向下流动。穆巴拉克的私有化改革加速了这一趋势，使国企迅速瓦解，国企工人或因私企改制而丧失原有劳动保障，或因提前退休或下岗进入低保行列（人数约 50 万，占国企工人总数的 1/3）。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济繁荣的消失，

① 毕健康著《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40 页。

② 指美元代替埃镑成为埃及的主要流通货币，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与 80 年代。

③ <http://loveegyptonline.yoo7.com/t7-topic>。

大批基建项目纷纷下马,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失去了工作机会,连同海湾战争中的近百万回国人员一起滞留在城市边缘区,形成了至今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城市边缘带”。

经过大分化与大组合,埃及于20世纪末形成了两个基本阶级: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上层阶级由3类不同的群体形成:纳赛尔革命前的地主与资本家,纳赛尔时期的上层官僚,以及萨-穆时期的各类新资本家。他们利用政府的对外开放与经济调整政策迅速崛起与壮大,基本垄断了各个行业,控制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政府成为其“俘虏”。^①下层阶级除了原有的贫农、农业工人,还包括从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以及大多数国企工人中跌落的群体,他们汇集为越来越庞大的社会边缘阶级。

萨-穆时期阶级结构的两极化加速进行,上、下层阶级明显扩大,中层阶级明显缩小。1991年,上层占总人口的3%,中层占45%,下层占52%。^②到2006年,上层增至18.4%,中层减至12.4%,下层增至69.1%。^③这一时期的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形向哑铃形转化,出现了不良的发展趋势。

埃及阶级结构演变的特征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200年来埃及阶级结构的演变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 阶级分层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根据马克思·韦伯对阶级的定义,阶级主要由3个要素构成: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以及社会名望。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这些要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不同。1805年以前,埃及的阶级主要由政治权力与军事功绩决定,传统伊斯兰教育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政治与军事要素掌握在外来的特权阶层奥斯曼人手中,只有伊斯兰教育能为埃及土著人打开向上流动的通道。1805年以后,军事要素的重要性总的趋势是迅速减弱,尤其是1952年以后行政官僚体系的迅速扩充大大挤压了军事阶层的地位。传统伊斯兰教育的作用在阿里家族的“西化”改革中迅速降低,虽然艰难地维系至今,但与现代世俗教育发展相比,传统伊斯兰教育已经处于越来越边缘的地位。现代世俗教育则不仅完全代替了传统宗教教育的阶级分层功能,在分层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等级身份要素在古代埃及一直决定着社会的基本结构,现代以来等级制度逐渐瓦解。阶级分层中各要素的地位变化不仅在此,在传统要素之外,经济财富成为200年来埃及阶级分层与古代埃及阶级分层相区别的核心要素。在阿里以来的200年中,除纳赛尔时期的18年外,财富要素的地位一直在上升,政治要素的地位则一直下降。

(二) 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200多年来,埃及社会摆脱了长期停滞,开始了加速流动的状态。埃及社会在原有的两个基本阶级中细化出各个阶层,这些阶层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内涵与规模。阿里时期,政府消灭了原有上层阶级马木鲁克,没收了伊斯兰宗教阶层的田产,解除了农民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将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改革,阿里重新调整了阶级结构,形成了以阿里家族为核心的军事封建主为一极、以农民为一极的两个基本阶级,农民的身份与地位都有所改善,社会两极的距离被拉近了,阶级结构由相互隔断的“二”字形态变化为梯形。19世纪中叶以后的100年间,埃及社会形成了以财产为基础的土地各阶级与资本各阶级,形成了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其中上层为欧洲资本家与奥斯曼地主,下层为农民与新生产业工人,中间阶层则是以原来农村乡绅、村长以及城市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中层农民与小资本家。随着现代教育的扩大,新知识分子占据了行政、军事体系以及自由职业的主体,成为新的中产阶级。

① [埃及]沙哈塔·隋耶木《后自由主义时代的埃及资产阶级思维结构》(阿拉伯文版),拉木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

② [埃及]贾拉勒·艾敏《埃及人怎么了:1945-1995年间埃及社会发展》(阿拉伯文版),新月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③ 笔者根据埃及国家统计局档案《2006年埃及全国人口普查报表》表9《按职业与种类划分的各省人口分布》(15岁以上)(阿拉伯文)计算出的数据。具体数据如下:在2003万从业人员中,除情况不明者19万人外,有行政管理人员95万,技术专家271万,技术人员173万,文秘73万,服务人员205万,农牧业熟练工人511万,手艺人327万,产业工人172万,普通技术工人155万。前两类是埃及社会学界认为的上层计366万,三、四类为中产阶级计246万,其他为下层计1370万。

1952 年以后, 埃及新政权再一次重构了阶级结构, 消灭了地主与大资本家阶级, 把土地平分给农民, 通过国有化运动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 造就了工人阶级, 下层阶级的状况大大改善。由此, 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形态迅速向梯形转变。萨达特以来, 随着再一次西化改革, 埃及国有经济迅速解体, 社会再次分化为以资本家为核心的上层和由无地农民与失业者构成的下层, 社会差距拉大, 阶级结构又一次从梯形向金字塔形及哑铃形发展。

(三) 引起阶级结构演变的原因发生了变化

阿里家族时期, 民族主义的兴起、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的渗透导致了新阶级结构的确立。阿里建立了省、县、村三级政权体系, 政府的行政能力从县城延伸至农村各地, 官僚机构的扩大带来了官僚阶层的扩大; 阿里对工农业进行统一的军事化管理, 造就了国有产业工人与国有耕地上的农民阶层。赛义德与伊斯梅尔被迫实行土地私有化, 造就了各农业阶层: 地主、富农、中农、小农、贫农与无地的农业工人。殖民时期欧洲资本家大举进入埃及, 形成垄断埃及经济的欧洲资本家阶层。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刺激了民族资本家阶层的诞生。纳赛尔时期, 政府的土地改革与国有化运动消灭了地主与大资本家阶级, 提高了国企工人与农民的地位。1967 年战争的惨败则引起了各阶级的反向流动。这一变化在萨-穆时期因国土收复、冷战格局结束以及石油经济崛起而加剧。由此可见, 200 年中引起埃及阶级结构变化的因素既有国内因素, 也有国际因素。这些因素在各时期对阶级结构的演变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例如, 英法在肢解奥斯曼帝国中都因投鼠忌器而不敢轻举妄动, 外力减小导致埃及地方势力坐大, 阿里乘机实施了比较独立的社会改革; 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埃及的外力最大, 甚至由英国直接控制了 40 年, 英国政策决定了埃及阶级结构的变化; 纳赛尔时期苏美争霸, 埃及成为被拉拢的对象, 外力减小使埃及的民族主义达到历史罕见的高潮, 纳赛尔改革成为数百年来埃及最为彻底的改革, 内力主宰了埃及阶级结构的变化。20 世纪后期苏联解体后, 美国在埃及的势力迅速扩张, 引起埃及社会的全面西化, 并导致阶级结构的大分化与两极的剧烈扩大。

(四) 阶级结构的演变越来越快

1805 年以前, 埃及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 传统军事封建制度维持了上千年。随着拿破仑入侵与阿里改革, 埃及社会开始破冰并一度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行, 在 40 年中消灭了原有的上层阶级。随后, 殖民主义者用 100 年左右的时间将埃及拉进了资本主义体系, 使之成为依附性的边缘国家, 同时将社会分化为农业各阶级与资本各阶级。纳赛尔时期, 政府通过政策改变阶级结构, 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地主阶级与大资本家阶级消失。40 年的萨-穆时期, 阶级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 速度与力度都达到历史少见的程度, 中产阶级普遍坠入下层, 而原有官僚与投机者中又涌现出了大量资本家。

(五) 阶级关系的变化越来越紧张

阿里时期, 阶级关系刚刚摆脱了封建主与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 优化为地主与农民的财产关系, 加上连年对外征讨, 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小, 社会形成了较好的合力。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 埃及下层受到殖民者与地主的双重压迫, 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 期间爆发了 1879 年阿拉比军事起义、1919 年埃及反英大起义、1952 年火烧开罗城以及自由军官政变。纳赛尔时期, 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弥合社会鸿沟, 消融阶级矛盾, 是埃及历史上阶级关系最好、阶级矛盾最少的时期之一。萨-穆时期, 埃及的阶级关系再次紧张, 发生了下层针对政府的 1977 年大饼暴动、20 世纪 90 年代的半内战^①、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的各种社会暴力事件与 2011 年的和平移交政权。

^① 1992~1996 年, 埃及政府与各反政府力量爆发了长期大规模武装冲突, 是自 1952 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埃及政局最动荡的时期, 平均每天都发生政治暴力事件, 平均每天死伤各一人。其主要标志为上埃及苏哈基省“迪鲁特伊斯兰共和国”与开罗“因巴巴伊斯兰共和国”与埃及政府的军事对抗, 政府动用了包括轰炸机在内的所有武器, 历时多年才勉强控制住局面。参见毕健康著: 前引书, 第 191~198 页。

阶级结构演变对当前埃及社会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有时两极的距离缩小,社会走向和谐;有时两极的距离扩大,社会动荡不宁,但总的趋势是各阶层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阿里时期与纳赛尔时期,社会的两极距离缩小,阶级结构呈良性发展,社会趋向团结合作。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以及萨-穆时期,社会两极不断扩大,阶级关系紧张。萨-穆时期,各个社会群体不仅在短时期内迅速流动,而且流动方向发生了恶性逆转,中层坠入下层,导致下层扩大,下层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在两极扩大的同时,正在形成新的阶级壁垒与“二”字形态的断裂结构。因此,当代埃及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社会风险很高,继 1977 年大饼暴动、1981 年枪杀萨达特与 20 世纪 90 年代半内战后,终于演变为 2011 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并导致穆巴拉克政权的终结。

在经济层面,各阶级形成了各自的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非生产性群体恶性膨胀,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如上层的消费品主要来自西方的进口商品,中层的消费品主要来自新建的工业区,而下层的消费品来自亚洲廉价的日用品、旧货市场以及传统作坊。这一格局导致国内长期无法形成统一的生产与消费链条,资源难以统一配置与优化。更有甚者,长期的半战争状态迫使政府保持了占全国劳动力 1/3 的官僚机构,连年不断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庞大国家机器的维持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层面,阶级结构恶化导致政府无暇致力于长期战略发展的思考与实施,执政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随意性与应急性。埃及目前实施的宪法是 1971 年制定的,许多条款已经失去现实基础。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政府专断与腐败程度的上升,导致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伊斯兰组织的势力越来越大。政府与反政府双方冲突以及地区冲突的持续不断,又迫使政府长期保持准军事状态,同时维持民族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如此反复,埃及政局陷入了“高压——反抗”的恶性循环之中,使政治呈现“军事、专制”的特征。但是,随着美国大中东改造计划的出炉,埃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并最终于 2011 年借助外力成功地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在文化层面,阶级结构的恶化引起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与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塌。由于政策全面“向西看”,以及对西方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的依赖,埃及政府完全投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怀抱。同时,海湾石油经济的崛起使埃及社会蔓延着十分浓烈的负面文化,如关注后世而淡漠现世、倾向炫耀式消费而忽视勤俭节约。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埃及的上层阶级中,并由此蔓延至其他阶层,导致整个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崩裂。

经过 200 年的现代化实践,埃及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变。展望未来,埃及阶级结构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阶级结构的优化,即缩小两极差异、扩大中间阶级,塑造具有生产与创新精神的主导阶级。阶级结构的优化又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的优化紧密相连。没有健康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良性的阶级结构;没有政治改革,国家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仍将缺失;没有文化变革,无法调动埃及人对现世的重视,无法将宗教力量化为巨大的生产力。总之,埃及社会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调整与改良,而是彻底走出“公有——私有”生产方式的简单循环,利用自己独特的内外资源,走出依赖大国的小国心态,利用外力而不依赖外力,借助传统积淀而推陈出新,走出崇古重训的传统思维,建构适合自己的阶级结构,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The Evolution of Class Structure in Egypt Since 1900s and Its Impact on Current Social Issues

Dai Xiaopi

pp. 25 – 32

Egyptian class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in formation of following 4 distinct periods: 1805 to 1840, the first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period (period of Muhammad Ali) , 1840 to 1952, the first external influence period (including Said and Ismail period and the colonial and semi – colonial period) , 1952 to 1970, the second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period (Nasser period) , 1970 to 2011, the second external

influence period (Sadat – Hosni Mubarak period) . These changes of class structure affected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lead to long – term social unrest. The tremendous change of class structure in Egyp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as mad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untry ’ 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Viewpoints on the Tendency to Sub – Saharan Africa Political Situation

Zhang Hongming

pp. 33 – 41

The Turmoil taking place in North Africa has not only mad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Arab world in the Middle East, but also posed a potential threat on sub – Saharan Africa. In terms of the future political trend in Africa: firstly, some countries in Sub – Saharan Africa, the political turmoil may be inevitable; but situation in Africa overall may keep stability. Secondly, even if unrest may occur in some countries of Sub – Saharan Africa, i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what happened in North African; the unrest here will not generate spillover effects like North Africa. The reasons are that, the ethnic structure, religious beliefs, cultural traditions, especially political reforms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etc. , these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from what in the Middle East. Therefore, “the overall stability while local turbulence” can still be regarded the norm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frica.

On Hamas’ Suicide Attacks

Chen Tianshe

pp. 55 – 63

The main body of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ers was young men. There were various motivations for the suicide attacks. There were four social factors for Hamas’ suicide attacks. Firstly, the miserable experiences of Palestinian became a hotbed of the suicide attackers. Secondly, the strong identity of the Palestinian to suicide attacks provided deep public bases for Hamas’ suicide attacks. Thirdly, the Palestinian turned to violence as a resort of the despair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peace process. Finally,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s had a lot of religious fac-

tors. The Hamas’ suicide attack caused two effects. One is that it caused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to fall into a vicious circle of “violence to violence”, but it strengthened the Hamas’ leader position as a resistant organization. Another is that it caused the martyrdom culture to become popular in Palestine and inspired many Palestinians to join the suicide attacks. In conclusion, the roots of the suicide attacks of Hamas and other Palestinian groups are the Palestinian despaired of the status quo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has not been revolved.